

的事情做好，就是对他最大的缅怀。

芦苇：我说天明的两件事。大家都知道，评论家都说天明是第五代导演的教父，我是目睹者。天明为了给第五代争取机会，为了扶持第五代，给人下跪过。因为他当厂长以后，就是拍电影。可是我们厂当时有一大批老年的导演，都一生干电影，但是没有拍过电影。他当厂长以后，这些人也都找他，也都希望得到拍电影的机会，而天明对他们是有看法的，有判断的。有一次，一个很老的导演，解放以前的，他一生没有拍电影，天明也不看好他。为了得到拍电影的机会，他一进办公室就跪在那儿了，说天明你当厂长了，你对我是知根知底，咱们俩关系也不错，你应该扶植我。天明对他是有看法的，因为他不适合当导演。天明二话没说，给他也扑通跪下了，两个人跪在那儿相视无言。他们两个人互相相视了足足有好几分钟的时间，最后那个人先站起来，他说厂长你起来，你给我跪，我不敢受。天明说，好，你知道你受不起我这一跪，你就不要跟我提条件，你把机会给更有希望的人。可是天明对第五代导演，当时是顶着巨大的压力。当时天明扶植了几个人，艺谋、凯歌、壮壮……别人不知道，我是西影厂的老职工，我知道。所以天明当时对我们这代人的成长，他是有担当，有风险，是顶住压力的。

第二件事，他当厂长的时候，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，我甚至觉得他不应该认识我。我也不过就是写了两个“疯狂”（剧本），赚了一些钱罢了。忽然有一天在厂门口碰见了，他说你是不是叫芦苇？我说是。他说，走，你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。到办公室以后，天明把门一关，说芦苇你小子不错，你拍

了两个疯狂，给厂里挣了钱了。这样吧，你说你想干什么，想干导演我调你到导演室去，想干编剧我调你到文学部去，你来自己选择吧。我在西影厂工作了十几年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领导这样对待我，这样看中我，当时心里特别感动。我说头儿，我不是一个编剧的材料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说你能不能扶植我一下，你给我一点钱，让我下去搜集素材，让我来写剧本就可以了。天明当时就说，你需要多少钱？根本没废话，他说我给你一千块钱够不够？一千块当时是个大数。在西影厂工作十几年，从来没有拿到过一千块钱。我说头儿给的太多了，我有点受不起。他说你需要多少？我说五百就可以。他当时把抽屉拉开，就给我数了五百块钱。他放到我的口袋里，说行了小伙，干去吧。再也没有别的话。三个月以后，我交给他两个提纲，一个是《黄河谣》，一个是《上起高山望平川》，当然《上起高山望平川》没有拍，《黄河谣》后来滕文骥拍了，也得大奖了，得了导演奖。这是我跟天明的一段往事。

最近的事情，我最后一个剧本是给天明写的，所以天明的离世我特别悲哀。我永远失去了跟天明合作的机会。《岁月无知》是我为他写的，他策划了好几年，一直找不到合适的编剧。后来我说，头儿，只要是你的事情，你不要说钱，什么都不说，我写，钱多我写，钱少我也写，不给钱我还写。天明当时说，这还像个样子，这还像回事，这还算是哥们儿。天明跟我握了一把手。这个电影，剧本我写出来了，但是天明走得太突然。我会永远深深地怀念老大哥，永远怀念我们的吴头儿。

（整理 李芳瑶 孙波 高蒙）

永远的吴天明

Forever in My Memory, Wu Tianming

文 沈及明 / Text/Shen Jiming

或许真的有心灵感应，我相信了。正巧那几天有个老朋友相邀聚会，想聊一聊80年代的事，要写点什么东西。我便在家翻查一些记叙文学艺术界80年代访谈录之类的书和文章，不知怎地，心里就想到了吴天明。但遗憾的是不见天明的踪影，不免失望，有些不平气和惆怅；书中也绝少80年代他与第四代电影导演群落的作为和贡献。历史不应有空白，不能有意无意地被遗忘，丢失。

就想，历史是不是一个U盘，有些曾经的存在和辉煌，会经常被消磁删除？

说感应，不料，3月5日，就得知天明猝然离世的新闻，心痛难忍，他昔日的音容笑貌立时浮现在眼前。他是一条硬汉子，铮铮铁骨一身正气，今再难寻！好在终于爆出了许多热赞他、感恩他的声音，虽已是在他身后了。死后的哀荣，场面也轰动、热闹，正应了他最后遗作的电影片名《百鸟朝凤》。难道真是天人感应，一切都有定数？这亦足可证明，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。天明在天堂能听到和感受到吗？我们还想听到他爽朗而豁达的大笑声！

20世纪80年代，是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，吴天

明、谢飞、张暖忻、郑洞天、黄健中、吴贻弓、滕文骥……等等，是承上启下第四代导演的中坚力量，他们虽已人到中年，但仍满怀激情，创新、探索不止，为中国留下《人生》、《老井》、《本命年》、《湘女萧萧》、《青春祭》、《北京你早》、《良家妇女》、《如意》、《邻居》、《城南旧事》等等一系列至今仍不失为瑰丽精品的影片。我和天明因电影而结缘，那时我在《当代电影》任副主编，因为吴天明的作品，因为他的为人，因为共同的艺术追求，我们成为朋友，编辑部的同志都喜欢他。《当代电影》曾发表过《人生》、《老井》影片的系列评论，以及天明的访问记，等等。天明每次到北京，总要到我们编辑部坐坐。在简陋的办公室，我们海阔天空聊天。他从来都是快言快语，高兴起来哈哈大笑。中午饿了，就在食堂给他打点饭，西北汉子风卷残云，吃饭也如他的性格，那叫爽快！天明就是那样真诚，热情，尽管那时已经担任西影厂厂长，其实他很艰难，但你从来都听不到半点怨言，他永远充满激情，像是随时都会燃烧！

当时，新上任的电影局长石方禹，是位具有艺术气质的诗人，他力主电影应打破条条框框，力求创新。为此，他组织了一个剧本咨询小组，到各电影厂去阅读要立项的剧本或有争议的剧本，有点现场办公的意思。小组成员共四个人，他亲任组长，我有幸成为小组的成员。我们一行到西影厂之前，方禹局长就说：“我看好吴天明，看看他给我们什么好剧本！”去之后，在众多剧本中，他最欣赏和看好的是一部作家张子良根据他自己的长篇散文诗《默默的小理河》改编的电影剧本，将由名不见经传的张子恩导演（后来他拍摄的《神鞭》曾轰动电影界）。但这部剧本在厂里充满争议，吴天明坚持，认为它是一部独特的充满人文精神的作品。得到方禹局长的支持，天明知道他和局长的艺术感觉和艺术追求是一致的，他喜出望外。于是，他又大胆提出想让方禹局长看看刚拍摄完，只剪辑连接起来的《红高粱》——尽管是还没有声音（连双片都不是）的片子。想不到，方禹局长说：“既然天明这样看好这片子，我一定支持，看！”本已订好了机票，于是立即改变行程，第二天即在放映室观看这部还未完成的片子。偌大的放映室，除了我们小组成员，仅有吴天明和《红高粱》的责任编辑李斌在场，连导演张艺谋都没能进场。李斌始终有些担心，她坐在我后面一直小声嘀咕：片子又没有声音，女演员也不漂亮，这么早看片，方禹要是不喜欢怎么办，天明会受多大打击！我安慰她说，你要相信天明，相信方禹，他俩性格不同，但对艺术的追求是一致的。其实，天明来北京的时候，就知道他正在支持张艺谋拍《红高粱》，从多处听说筹备过程就充满争议，天明承担着风险。但他坚信未来的影片必将震动人心。我非常相信天明的判断，也相信张艺谋的创作能力。果然，片子刚刚放映，几个镜头就把人震住了！我看方禹



吴天明导演工作照（《百鸟朝凤》）

局长看得很专注，很兴奋。放映快结束时，方禹局长问我，怎么样？我说太棒了，震撼人心。片子刚一放完，室灯一亮，方禹就站起来鼓掌，竖起大姆指说：“好！”“天明好样的，艺谋好样的！”吴天明激动地跑过来，给了局长一个大的熊抱，高声喊着：“走，吃羊肉泡馍去！”我看李斌的眼中已充满了泪水。我们一行人高兴地走出厂门，只见张艺谋正蹲在厂门口，在紧张地等消息，还不知道结果；他大概饿极了，正在吃肉夹馍。方禹走过去对艺谋竖起大姆指，连连说：“好，真棒”，“天明好样的，你一定别辜负他，好好打造一部精品！”艺谋脸上顿时绽开了笑容，天明大声吆喝着：“走，吃羊肉泡馍去，边吃边聊！”此后，《红高粱》轰动国内外影坛，张艺谋一举成名。

天明在电影圈人缘好，口碑好，是公认的。他和第四代、第五代导演，以及一些刊物编辑、影评家、研究者都是赤诚相见。我们成为一生的好友。天明知道我爱吃烤羊肉串，那时北京还没有多少卖羊肉串的地方，他特别托人打造了一个烤羊肉串的炉子，从西安运到北京给我送到家。记得，在我们家招待过多少电影界的朋友，常是一二十人挤在我家的小屋，就用天明送的炉子，烤着香喷喷的羊肉串，喝着冒着泡沫的啤酒，其乐融融，高谈阔论，论影片，谈创作，常是豪言壮语，妙语连珠，好不惬意。多少年之后，时过境迁，虽然后来可以有钱去吃大餐聚会了，但朋友们仍会怀念那简陋的“羊肉串沙龙”，自然还会情不自禁地想念起远在异国他乡的吴天明。

最后一次见吴天明，是他在国外漂泊几年之后，早已费尽心血回到了中国，又多少年过去了。那天，黄健中从艺五十年的纪念活动，天明来了，仍然是光头，爽朗、激情依旧，高声大笑大喊，给所有朋友一个大大的熊抱！从外表完全看不出他内心有隐痛，有挣扎。许多人并不知晓他壮志未酬的苦闷。那天唯见谢飞胸臆间似有什么在翻腾，他把黄健中悄悄拉到我所在的桌，对健中说：“你帮帮天明，你认识那么多投资人，给天明介绍几个，让他们也为天明投资。”健中说：“不是没谈过，但现在很多投资人，只看最大利益化，市场化；但在这方面，天

明毫不妥协，几次都没谈成，我再努力。”啊，伯乐难寻。

现在许多人和文章，都在称颂天明是“影坛伯乐”，无私地扶持了不少影坛新人，这其中真真切切有不少感人的“伯乐”事迹。诚然，他是一位难得的优异的电影事业家；但他不仅是幕后的“推手”，更应该被关注和称道的，吴天明首先是一位优秀的、有独特的美学追求的电影导演艺术家，他本人就是一匹骏健奔腾的千里马！他的“伯乐”在哪里呢？时至今日，学界电影界仍然没有对他的作品进行系统深刻的研究，没有对他在80年代对中国电影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做出深入探讨和评价。当年钟惦棐先生提出要拍中国的“西部片”，曾是许多电影人热议的电影美学课题，而吴天明已然是扬蹄奋行，拍出了自己的几部鲜明、浓郁的西北特色的影片。他身体力行拉动了西影厂，拍出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影片，多年排名全国第一，被称为“西影现象”，应该说这也是应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“吴天明现象”。因为某种原因他似乎被边缘化了，致使这一段电影史留下一片空白。其中，我们对吴天明艺术品格的真正认识，是他导演的《老井》令人们刮目相看，

并不仅仅是这部影片轰动国际影坛，得了几项大奖；更重要的是影片中那浓浓的乡土之情，那农村的真实深深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，鲜明地显示出那属于吴天明独特的电影美学追求，是他刻骨铭心的艺术理想。这是80年代中国电影的骄傲。现在，也许有人认为，天明的电影“过时了”，“是老派的电影”，“拍摄手法及表达样式老化”，“不能适应社会多元化和商业社会对电影的要求”，等等。先且慢下这样的定论吧，这一切论调都不能成为拍摄出那么多商业烂片的遮羞布！现在该是郑重呼吁我们的电影史家和理论家的时候了，认真研究吴天明。艺术电影田园将荒芜的时候，包括他坚持反对的“娱乐至死”，不也该有论证一番的必要吗？总之，写出专著，写一部大书，填补那一段电影历史的空白，我想那会比多少明星生活自传之类的书，更厚重更有价值得多。不是许多电影艺术家在呼唤“返璞归真”吗？也在拍摄力图让真实的人类真灵性归来的影片！

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！对着天明的在天之灵，真想呼一声回来吧！

天明，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！

(沈及明，原《当代电影》副主编，100009)

吴天明访谈录

The Interview with Wu Tianming

时间：2012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

摄像及录音：孙波

采访及文字整理：陈墨

地点：北京曲江公司办公室

家史简述：从山东到陕西

陈墨（下简称陈）：吴导，感谢您接受中国电影资料馆的“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”采访。您接受采访很多，没有一千次也有九百次了。咱们是开放式，以您说为主，然后我来问。

吴天明（下简称吴）：我也没有做什么准备，我看你还准备那么多的资料，查那么多的文件，你随时提醒。时间长了记不住，咱今天就先说我们家的事。

前头这一部分，听我爷爷和父亲说的。我们家祖籍是山东莱芜。莱芜的那个村子的名字，听我父亲说，叫黄泥沟，现在好像叫黄村。据说离县城也就10里左右。我2002年拍《首席执行官》的时候去过一次，是山东电视台几个朋友陪着去。去了以后，县领导还很重视，弄了几辆车，给村里通知。村子里头早上五六点起来几十个人就修路。黄泥沟嘛，路不好，就铺沙子。我们到下午才去，（村里人用）红布挂了几

条标语，“欢迎吴天明回乡”什么的。那一个村子人都姓吴。当时跟我平辈的大概还有四五个人，上一辈都没了。那个村子大概有三四百人，都是我们吴家，是我曾祖父的哥哥的后代。

据我父亲说，是在清朝末年，大概是1882到1885年间，是我曾祖父和他的一个哥哥（或是弟弟），还有我曾祖母，一共六七个人，挑着担子过来（陕西），就在耀县南移村扎下来了。耀县在三原县后面的那个原上，那一块地方有好多村子都是山东移民。你看叫北移村、南移村嘛，都是移过来的。当时那个地方，地上全是荒草，一人多高的荒草，那个地荒了多少年。去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圈地，你有多大能耐你圈多大。我曾祖父，他和弟弟六七口人，劳力多，十几年就成大地主了，就很富了。当时家里的长工就雇了四五个，骡马有十几匹，那就相当可以了。山东人又能吃苦。